

塑造“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 刘志彪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也特别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不难看出，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核心问题，当然也是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要素。只有通过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才能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基础和载体，才能确立起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才能为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创造条件。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的要求，就是要解决市场取向改革不足与市场取向改革过度并存的问题，塑造“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在 市场门类上，加速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从总体上看，我国商品和服务市场化改革彻底、发育健全、竞争充分，但是要素和资源市场如土地、资本、高级劳动力和技术和数据市场等市场化取向改革不足，有些刚开始发育，有些并没有真正实现市场化竞争。市场门类发育不均衡的原因，客观上是要素的属性要比商品服务更为复杂，有些要素附着更多的非经济因素，市场化程度可能弱一些，如劳动力附着于具有尊严的个人身上；土地带有一定的公共品属性，它还是农民的社会保障中最后的支撑体系；资本则剩剩索取权和社会阶层区分等联系在一起。鉴此，政府一般会根据要素的基本特性，按照社会稳定与效率相互协调的原则，小心分类、分步地推进市场化改革。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控制要素流动由于会使控制者掌握要素使用权并获取租金，因此在改革中要防止那种借口要素市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而推迟或拖延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倾向。

在 市场规模上，把潜在规模优势转化为现实市场规模优势。从“市场体

系”到“统一市场”再到“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些提法的变化意味着政策取向要从建设市场到建设一体化市场，再到建设大市场 and 强市场。我们一直是大规模国家，但是目前还不是大规模市场的国家，更不是强大市场国家。我们的市场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低，虽然因为人口多、加总算起来也不小了，但是市场呈现为行政分割状态，因此它只是潜在规模大，实际规模并不具有竞争优势，可以被规模经济利用的可能性并不大。推动潜在大市场走向现实的强大市场，除了要通过深化改革释放生产率、逐步提升居民工资水平、分好国民收入这块蛋糕外（这些都是做大市场规模的基本前提），还有两个重要的相关问题：一是大力纠正导致市场分割的行政因素、法治因素、社会文化因素，鼓励区域一体化发展；二是要加快资本市场化建设，通过资本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提高财产性收入的比重。这是在扩大工资占比条件受限的前提下，可以迅速做大做强市场规模的关键一环。

在 市场结构上，尽快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我国产业的市场结构由于缺少充分的资产兼并市场的洗礼，以及行政区经济的阻碍，企业之间相对缺乏密切的产业分工合作关系，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有待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含义，就是要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载体上，建立起既不是原子化的市场竞争，也不是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在这种市场结构下，某些产业中往往存在若干相互激烈竞争的大型和特大型企业，它们就是产业链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的“链主”。而其背后则是一大批纳入产业链治理体系的中小微专精特新企业，这些中小微企业处于产业链的上游，是链主们的中间投入品供应商，具有专门的知识或技术诀窍，成为产业链上的“隐形冠军”，它们与链主的关系呈现为密切的“依赖性关系”。同时，广大的传统产业中的中小企业，则活跃于这些大型和特大型企业不涉及不涉足的产业领域，不与大型和特大型企业之间发生正面的直接竞争，与后者呈现为国

民经济的“补充性关系”。

在 市场价格参数上，尽快形成广义价格调节机制系统。充分竞争后形成的广义市场价格参数的调节作用，至少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有效的信息传递功能；二是引导资源配置功能；三是内在的激励约束功能；四是收入分配功能。某类市场价格参数的市场化改革不足的话，一是会导致该产业市场上这些基本功能的弱化或消失；二是会对广义价格体系的基本功能产生连锁扭曲。如土地市场竞争不充分，其垄断定价对资源配置过程发出了错误的利益激励信号，不仅会导致土地资源置低效率，而且会影响其他行业获取正常利润，从而影响到一代青年人追求创新创业的理想和热情、职业选择和婚姻状态，等等。显然，根本的解决方法，不是去限制价格参数调节作用，因为越限制供给越紧张、价格越高，而是要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放开进行充分竞争。

在 市场空间上，以一体化发展作为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选择性变量。受“行政区经济”特性的限制，不仅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步伐滞后，而且区域市场一体化进展也有待根本性突破。表现在各地热衷于追求低层次重复建设项目，进行过度的同质竞争，搞“小而全”的自我小循环，或以“内循环”的名义搞地区封锁，诸如制定歧视外地企业、实行地方保护的各类优惠政策，在招商引资中进行政策的“逐底竞争”，牺牲国家整体利益，等等。当优惠政策和各种歧视成了获取竞争力的来源，自然无法进行以效率为基础的公平竞争，统一大市场建设当然无从谈起。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一是从纵向方面改变中央各部门给地区各种优惠政策的做法，不能让随意的政策优惠成为吸引资源流动的政策“洼地”，不能诱导地方为争取优惠政策“跑步进京”；二是强调

对现有各种优惠政策区进行一体化改造，就是对各种国家区域政策进行开放和区域复制，以平等国家区域战略中的各地区竞争条件，为区域一体化扫清政策障碍，如区域性股权市场和全国性证券市场板块间的合作衔接等；三是为地方政府干预市场行为制定“负面清单”，尤其要防止其利用超经济强制力量行使行政垄断的行为；四是改变地方政府决策的目标函数偏好，从数量、速度偏好转向质量、效率偏好；五是逐步减少地方政府的市场活动参与职能，让其多承担区域公共产品提供者职能，以化解其干预市场的内在冲动。

在 市场环境上，最大限度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市场化、法治化与国际化是市场环境（营商环境）建设的三大方向和目标。就当前市场化营商环境建设的重点来说，一是为企业市场准入制定好“全国一张负面清单”，不仅要放宽市场准入门槛，而且要公平各类企业准入的条件；二是推动企业减轻各种制度性成本负担，如放管服改革，如降低用能、物流、租金、融资等环节成本；三是完善具有半公共性的水电气暖价格形成机制，如在上游能源价格上涨的条件下，电力产出的价格要适当地弹性化放开，同时辅之以给居民必要的补贴。总之，如果说要素市场的竞争程度直接决定企业生产成本水平，那么市场环境建设的上述三个方面的优化程度，则直接决定企业的交易成本大小。由于交易成本大多数是企业很难控制的外部制度性成本，市场环境的改善将极大地促进企业效率的提升。市场环境建设涉及市场政策统一、规则一致、行动协同等基础问题，是政府的主要职能所在。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就是要从上述三个方面改革政府目标、政策结构、工作职能和工作机制等。

（作者系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厚价值、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得到国际同行广泛认可，文物保护利用助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

十年斗转星移、日新月异，牢记不改的，是我们党珍视文化遗产、赓续民族文脉的时代重任，坚守不变的，是广大文物工作者坚守一线、严谨求实的责任担当。

十年接续奋斗、继往开来。如今，文物工作的思想基础、政策基础、实践基础、民心基础更加坚实，但同时，也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重点领域改革攻坚难度加大等突出问题，特别是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要求相比、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踏上新的百年征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文物事业要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推动文物保护利用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自觉将文物保护利用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实践、置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动文物工作与时代发展同步同向、为社会进步赋能添彩。必须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研究阐释，坚决守住文物安全底线。在城乡建设中依法加强文物保护管理，不辱使命、守土尽责，持续加大打击防范文物犯罪力度，确保文物安全。在时代变迁中持之以恒加强考古和文物研究，躬耕田野、求真致用，更好认识和阐释中华文明历史进程，更好传承中华文明。必须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研究阐释，坚决守住文物安全底线。在城乡建设中依法加强文物保护管理，不辱使命、守土尽责，持续加大打击防范文物犯罪力度，确保文物安全。在时代变迁中持之以恒加强考古和文物研究，躬耕田野、求真致用，更好认识和阐释中华文明历史进程，更好传承中华文明。必须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研究阐释，坚决守住文物安全底线。在城乡建设中依法加强文物保护管理，不辱使命、守土尽责，持续加大打击防范文物犯罪力度，确保文物安全。在时代变迁中持之以恒加强考古和文物研究，躬耕田野、求真致用，更好认识和阐释中华文明历史进程，更好传承中华文明。

（作者系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

（上接1版头条）这项工作启动2年多来，我们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和一体化发展理念，聚焦“两中心两地”战略定位，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齐心协力办好合作的事情，努力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川渝间，强化双核联动、双城带动、双圈互动、两翼协同，建立4级合作机制，召开5次党政联席会议，持续深化各领域协同、全方位合作，一批重大规划、重点改革、重要协议落地落实，成渝中线高铁等160个重大项目滚动实施，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等10个毗邻地区合作平台加快建设，推出川渝通办事项311项，成渝地区在发展态势、创新动能、开放能级、融合融通等方面实现了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可喜变化，双城经济圈建设迈入全面提速、整体成势新阶段。市域内，推动“一区两群”发挥优势、彰显特色、协同发展，分片区制定实施三年建设行动方案，建立健全市域“一区两群”协调发展机制和区县对口协同发展机制，主城都市区龙头带动作用不断增强，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步伐加快，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文旅融合、城乡协同发展有力有效，区域协调联动发展的美好图景正徐徐展开。

加快推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重庆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我们全面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不断为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力、拓展新空间。提升开放通道效率，瞄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统筹铁公水空四式联运，完善出海出境大通道体系，强化内陆国际物流枢纽支撑，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通达107个国家（地区）、319个港口，中欧班列（成渝）运营水平保持全国领先，成渝世界级机场群正加快建设。提升开放平台能级，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累计签约商业项目252.5亿美元、金融贸易试验区151项改革试点任务全部落实，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重庆经开区等辐射引领功能持续拓展。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制定高质量实施RCEP行动计划，积极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2021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8000亿元，实际利用外资5年累计达到517亿美元。提升营商环境质量，推进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建设和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深化国资国企、财税金融、“放管服”等重点领域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取得积极进展，全市5年累计新增市场主体超过100万户，目前总量达到330万户，民营经济增加值占比达到59.6%。

大力推动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建设。重庆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我们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以能酿出美酒的标准保护长江水质，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着眼“降碳”，调整优化能源、产业、交通运输、用地结构，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全市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5年下降16.1%。着眼“减污”，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总体为优，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稳定在300天以上。着眼“扩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施“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工程，基本完成缙云山、水磨溪等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修复，完成长江“十年禁渔”退捕任务，全市5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192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到54.5%。着眼“增长”，制定实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绿色行动计划，积极推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全市绿色产业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0%。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山水之城、美丽之地魅力更加彰显。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还是千家万户的事，强调要集中全力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我们坚持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从最困难的群体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着眼、从最具体的工作抓起，统筹推进民生改善、城乡建设、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高品质生活取得明显进展。

统筹脱贫攻坚和民生事业发展。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动态识别的190.6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8个贫困区县全部摘帽，1919个贫困村全部出列，重庆同全国人民一道告别了延续千年的绝对贫困。社会民生持续改善，每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的80%左右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每年滚动实施重点民生实事，教育、就业、社保、医疗、住房等民生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年年均增长8.9%。

统筹乡村振兴和城市更新提升。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乡村振兴是重庆发展的最大潜力，城市更新提升是重庆发展的最强动力。我们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持续深化农村“三变”改革，壮大新型村级集体经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坚决守住粮食安全、耕地保护、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三条底线”，粮食年产量稳定在1100万吨左右，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9%，5年建成“四好农村路”6.8万公里、改造农村危房超过10万户，农村集体经济“空壳村”基本清零。扎实推进城市更新提升，编制全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完成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米”字型高铁网和“轨道上的都市区”加快建设，高铁和城市轨道交通通车里程分别达到1023公里、450公里，高速公路基本实现县县通；深化以“两江四岸”为主轴的城市有机更新，强化城市有序管理、有机管理、应急管理、精细管理、共治管理，城市功能品质持续提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0.3%，建设“近者悦、远者来”的美好城市取得积极进展。

统筹发展和安全。慎终如始做好疫情防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动态清零，因时因势完善防控措施，编制完善“1+14+1”应急预案，有力有序做好局部疫情处置和常态化防控，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深化“枫桥经验”重庆实践，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形成了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重庆发展取得的成绩，最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只要我们一切行动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听党中央指挥，工作就有底气，发展就有希望，事业就能顺利。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一起向未来，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一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紧紧围绕进一步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这条主线，真抓实干、埋头苦干，行千里而积跬步，敢广大而尽精微，奋力书写重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篇章，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上接1版二条）

这是文物工作格局不断拓展的十年，文物保护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大局、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作用显著提升。党的十九大将“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为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加强文物古籍保护、研究、利用，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列为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目标，十九届六中全会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首次写入党的历史决议，“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成为全党意志。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深改委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让文物活起来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实施意见》，一系列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改革任务渐次铺开、积厚成势，文物事业改革发展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部署。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等重大政策文件，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区域重大战略对文物保护利用作出专门部署，《“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首次上升为国家级专项规划，文物工作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这是文物保护意识持续增强的十年，“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文化自觉，保护好利用好文物资源的社会共识深入人心。各级党委和政府文物保护责任意识显著增强，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机构编制大幅提增，中央各部门通力协作，联合出台政策文件、联合部署专项行动、联合开展专题活动，加强顶层设计、统筹部署；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亲力亲为抓文物工作渐成惯例，27个省级政府将文物安全纳入年度考核评价体系，省级文物行政力量总体得到加强。越来越多的地方将文物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优势资源，践行“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因地制宜、创新举措，合理有效盘活文物建筑、革命文物、工业遗产、传统村落等各类资源，建设“博物馆之城”、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赋能城市更新、

乡村振兴，古城保护与现代化建设交相辉映。人民群众参与文物保护的热情日益高涨，文物保护志愿者、社会组织和民间文物收藏队伍稳步壮大，文明守望工程、拯救老屋行动、长城公募计划等成效渐显，特别是大运河保护申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革命旧址修缮等文物保护成果广泛惠及民生，让人民群众在实际获得中增进对文物保护的理解认同。

这是保护研究力度全面加大的十年，文物保护状况持续改善，考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文物资源内涵扩大、总量激增，完成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石窟寺等专项调查，公布两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省、市县级文保单位数量分别增长115%、58%、88%。文物保护投入加大、成效显著，中央财政文物保护资金十年累计投入1000多亿元，年均稳中有增；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文化遗产、长江三峡文物、西藏重点文物、山西南部早期建筑、孔府档案文物等重大保护工程相继竣工，馆藏珍贵文物保护修复取得重要进展，博物馆标准化库房建设工程基本完成。考古工作纵深拓展、实现突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接续推进，“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全面展开，8800余项考古发掘项目有序实施，浙江良渚、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四川三星堆、新疆石城子、西藏玛不错等考古工作取得重大发现，河北太子城、河南双槐树等一批重要遗址在国家重大工程、城乡基本建设考古中及时发现和妥善保护，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进一步勾勒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进程。管理制度织密织牢、从严执行，制定修订实施《博物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17部法律法规、200余部地方性法规推动文物保护法律制度日臻完善，特别是革命文物等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地方性法规增至36部；“先考古、后出让”在越来越多地方实行，大遗址、文物密集区逐步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管控体系，石窟寺、世界文化遗产等文物景区游客承载量从严设定；出台加强民间收藏文物管理一揽子政策措施，文物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文物进出境审核管理服务不断优化，在全国布局涉案文

物鉴定评估机构；文物安全严防严管，严打严治长效机制健全完善，打击文物犯罪、火灾隐患整治、文物法人违法案件整治取得重要成果，历史文化名城大拆大建问题得到坚决纠正，文物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这是文博博物馆影响有效扩大的十年，社会关注度、文化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空前提升。博物馆走向社会舞台中央，全国博物馆数量、年举办展览数量、年参观人次分别增长60%、144%、119%，现有备案博物馆6183家，其中90%免费开放，77%的区县建有博物馆，500多万件/套藏品数据信息全民共享，博物馆资源不断向基层延伸、向创意拓展、向云端呈现，不仅成为区域文化地标，更成为青少年教育的重要阵地、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革命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3.6万余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00多万件/套国有馆藏革命文物摸清家底，全国各地公布完成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革命遗址、延安革命旧址群、抗战文物、长征文化线路、百年党史文物等重大保护展示工程深入实施，在发展红色旅游、助力老区振兴中传承红色基因、激发爱国热情。文物价值阐释传播方兴未艾，考古新发现、文物新展览、文博新节目、文创新产品备受大众青睐，圆明园虎麓、天龙山佛首等“国宝回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生动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